

社会工作何以助推农村妇女新内生式发展?

祁颖菲

(华东理工大学 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上海 200237)



摘 要 农村妇女的内生能力发展状况关系到农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走向和结果。基于“能力—嵌入”的整合性分析框架,对社会工作助推农村妇女新内生式发展的运作机制及其条件要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从动态机制来看,社会工作将情感嵌入日常生活以塑造农村妇女发展源动力,将资源嵌入妇女经济组织以实现资源高效转化,将关系嵌入合作网络以提供农村妇女可持续性发展动能,将价值嵌入公共情境以推动农村妇女主体性生产,最终以“扩散式”嵌入的过程理路构建农村妇女“复合型”内生发展能力体系;从静态要素来看,农村妇女新内生式发展可持续运行需要文化敏感性、专业性、日常性要素作为内在支撑,其中,文化敏感性能够帮助社会工作获取服务开展的“情境合法性”,专业性使社会工作在理念创新的前提下提升外部资源的利用与转化率,社会性确保了社会工作能够在实践中避免个体化倾向,日常性帮助社会工作在“日常生活”中构建农村妇女参与乡村政治的生活化路径。

关键词 农村妇女发展实践;新内生发展理论;嵌入理论;社会工作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456(2025)03-0187-12

DOI编码:10.13300/j.cnki.hnwkxb.2025.03.01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离不开妇女,发展要惠及包括妇女在内的全体人民。”^①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为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三农”工作指明了方向^②。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继续围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一主题,对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进行了重要部署,强调“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③。城乡融合既是时代发展对广大农村妇女提出的新的更高要求,也是农村妇女实现自身价值的历史机遇。在此背景下,农村妇女发展状况引起学界重视。梳理当前农村妇女发展相关研究,发现农村妇女发展实践经历了“外源—内生—新内生”三个取向的转变过程。

自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推进城乡协调发展,加快打通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的制度化通道”以来^④,国家不断破除城乡二元体制的壁垒,重塑城乡关系、走融合发展之路,推动城市资源向乡村流动,促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有机结合。政府、企业等行动主体以“资源下乡”“资本下乡”等方式,重构农村妇女的生计框架,提高农村妇女的个人收入^[1-2]。但这种外源发展模式遵循

收稿日期:2024-06-1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共同富裕进程中县域乡村振兴研究”(22VRC177);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居业共同体’的实现机制研究”(24CSH041)。

① 资料来源于新华网:习近平在全球妇女峰会上的讲话(全文),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9/28/c_128272780.htm。

② 资料来源于新华社: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https://www.gov.cn/zhuanqi/19thcpc/baogao.htm>。

③ 资料来源于新华社: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407/content_6963409.htm。

④ 资料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公布 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http://www.moa.gov.cn/ztzl/jj2021zyyhjw/zxgz_26476/202102/t20210222_6361874.htm。

的是“自上而下”的干预、投入、改造等发展路径,不仅易造成农村妇女对资源的进一步依赖,形成农村妇女的“等靠要”心理,还可能挤压独特的乡村文化,导致乡土文化进一步被消解。为克服外源发展模式在指导妇女发展实践时产生的局限性,有学者立足内生发展理论,提出促进农村妇女发展的根本之举在于突出强调农村妇女发展的主体性与能动性^[3-4]。在日益“空心化”的乡村社会,完全不依赖外部力量而实现农村妇女内生式发展显然违背现实规律——内生式发展需要打破地域限制,推动内外行动主体间的良性互动。

基于对内生发展理论的反思,新内生发展理论应运而生。该理论由英国农业经济学家 Ray 在 21 世纪初提出,用以描述经济、技术等外部资源与本土特质在农村地区具有同等重要性的特征^[5]。新内生发展理论试图在外部资源和内部动力之间找到平衡,强调地区发展单纯依靠区域内部资源和个体的努力以摆脱发展困境的想法过于理想化,应合理破除地域限制,借助行政力量、市场资源等外部力量,将外部力量转化为内部发展动力,推动地区可持续、高质量的新内生式发展。新内生发展理论为农村妇女发展实践指明了一条“新的道路”^[6-8]。结合上述研究,农村妇女新内生式发展的实质可被理解为:在外部力量的推动下,立足乡村社会现实,对农村妇女的内生性力量进行激活和提升,使农村妇女真正成为乡村建设的主导者与受益者,进而构建起“以外促内、以内为主、内外结合”的新内生式发展格局。

《“十四五”民政事业发展规划》提出,社会力量应积极向乡村提供民政公共服务,共同推进乡村振兴^①。社会工作作为日益壮大的社会力量,近年来在政策号召下成为助推乡村振兴的重要主体,对农村妇女发展实践形成有益补充^[9]。由此引发本文的问题意识:社会工作能够基于何种实践路径激活农村妇女的内生发展能力?这一实践路径背后又蕴藏着怎样的机制理路?社会工作是凭借怎样的内在条件要素支撑起这一运作机制的?

鉴于此,本文在理清新内生发展理论内涵的前提下,引入嵌入理论,探讨嵌入理论与新内生发展理论之间存在的适配性与契合性,将其作为文章的理论基础;随后提炼和总结农村妇女内生发展能力体系所涵盖的文化、经济、社会、政治四个要素,在此基础上构建社会工作助推农村妇女新内生式发展的“嵌入—能力”分析框架;最后以江西省萍乡市友谊社工机构承接实施的林村^②“妈妈味道”妇女合作社服务项目为例,详细呈现社会工作参与和推进此项目的具体实践过程,进而深入剖析社会工作助推农村妇女新内生式发展遵循的具体运作机制及其条件要素,以期为社会工作促进农村妇女发展提供更具有针对性和可行性的学理基础与实践路径。

一、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1. 理论基础

(1)新内生发展理论与嵌入理论的适配与契合。自新内生发展理论提出以来,不断有学者对该理论的内涵加以反思和拓展。Markantoni 在农村研究中揭示了文化实践和地方认同推动农村地区发展的实践路径^[10],为新内生发展理论增添了文化动力学的维度。Scott 等探讨了农村发展政策理想范式的转变,认为农村地区的发展不仅受地方内部力量影响,也与更广泛的政治、制度、经济和自然环境存在着密切关联与互动^[11]。尽管学者们对新内生发展理论的理解与诠释存在差异,但仍能从中提炼出新内生发展理论所包含的三个特性:一是主体性。新内生发展理论延续了内生发展理论“自下而上”的主体性视角,强调“作为地方性主体的人或村庄依靠自己的主体性力量来完成自己发展的过程”^[12],即地方同时拥有对发展选项的决定权、对发展进程的控制权、对发展利益的享有权;二是互联性。新内生发展淡化了城乡地域边界在理论构成上的重要性,重视内部与外部、地方与超地方的整合^[13],进而消解两种力量之间的互斥性,构建起一个互联的“发展共同体”;三是整体性。经济资本的增加只是地方发展的一个方面,社会资本、人力资本等要素的积累在发展过程中同样重要。

① 资料来源于中国政府网:《“十四五”民政事业发展规划》发布, https://www.gov.cn/xinwen/2021-06/22/content_5619956.htm。

② 按照学术惯例,已对涉及调研过程中的地名(市级以下)、人名、机构、项目名称均进行匿名化处理。

嵌入理论最早由匈牙利哲学家卡尔·波兰尼提出^[14]。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市场经济的兴起对社会结构和人类行为产生深远影响,波兰尼从这一背景出发,提出“经济行为和经济制度嵌入于社会关系之中”的主张。随后,美国社会学家Granovetter对嵌入理论进行了补充,他认为经济活动往往以“关系性嵌入”和“结构性嵌入”两种方式与政治、社会进行互嵌^[15]。换言之,经济活动如市场交易、生产和分配等并非应然的存在,而是深植于其所处的社会结构、文化习俗和政治环境之中。随着嵌入理论的发展和完善,该理论也被国内学者运用于农业发展、基层治理、乡村建设等研究领域,并提出“差序嵌入”^[16]“曲线嵌入”^[17]“脱嵌一再嵌入”^[18]等嵌入类型。

综上所述,嵌入理论的核心内涵是指外部主体通过一定方式介入特定的经济社会场域,发挥外部力量促进该场域内的主体关系、主体结构或运作机制再造的过程,这与新内生发展理论主张外部和内部力量在一定的社会情境中衔接互动的观点相一致——外部力量的嵌入可以有效驱动内部力量的自主性和主体性,日益增长的内部力量又能与外部力量相融合,最终构成“外源促内生”“内外协同”的新内生发展格局。因此,新内生发展理论与嵌入理论存在着高度的适配性和契合性,能够在研究中得以耦合并指导实践。

(2)主体与资源嵌入推动农村妇女新内生式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农村面临着社会结构深刻转型与体制急剧变迁的现实境况,农村基层组织权力弱化、公共资源碎片化、大量男性青壮年劳动力外流等因素导致了农村妇女面临更多的生活挑战和压力,农村妇女处于弱势地位^[19]。在此背景下,外部力量的嵌入是激活农村妇女内生发展能力的重要途径。一是资源嵌入。新内生发展理论强调,个体的内生发展依赖外部资源的投入。如国家基于一定的政策,将自身掌握的行政资源以“项目制”的供给方式,直接地渗透至乡村社会各级体系中,激活农村妇女的内生发展动力^[20]。二是主体嵌入。新内生式发展建立在内外行动主体间形成的网络结构之上。因此,政府往往通过推动建立自身与农村妇女之间的“中间层”,提升农村妇女的再组织化程度,广泛动员农村妇女的集体性力量,为农村妇女发展提供坚实的群众基础^[21]。此外,企业或其他营利性市场组织基于慈善与践行社会责任的目标,直接成为农村妇女就业创业、产业扶贫等支持项目的行动主体^[22],为农村妇女的内生发展提供持久的动力引擎。概言之,政府、市场等外部行动主体通过资源嵌入与主体嵌入的方式培育农村妇女的公共性与主体性意识,助推农村妇女的再组织化过程,重构以农村妇女为核心的乡村社会组织网络,构成农村妇女新内生发展格局。

以上研究对解释和推动农村妇女新内生式发展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但仍存在以下可进一步探讨的空间:其一,研究主要关注外部主体将资源或主体嵌入农村妇女具体发展场域的实践过程,却并未对外部力量转化为农村妇女内生发展能力的动态机制进行明确的分析与阐释;其二,已有研究指出,“嵌入性”是我国本土社会工作的重要专业特性^[23-24],社会工作能够以“三重嵌入”^[25]“分化嵌入”^[26]等方式参与乡村建设、推动乡村发展。但研究者们并未充分意识到,社会工作嵌入实现农村妇女的新内生发展同样具备可能性与可行性。因此,本文将尝试构建一个整合性的分析框架,并在此基础上探讨社会工作助推农村妇女新内生式发展的机制及其条件。

2.“嵌入—能力”:社会工作助推农村妇女新内生式发展的分析框架

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结合新内生发展理论,农村妇女的内生发展能力应涵盖文化、经济、社会、政治四个维度。其中,文化发展能力是精神动力,促使农村妇女重新认识乡村传统文化的内在价值,树立地方文化自信,并将文化资源作为自身发展的“软实力”;经济发展能力是前提条件,直接与农村妇女的生存状况与经济地位相关联,确保农村妇女在不断变动的市场环境中保持自身的经济自主性和独立性;社会发展能力是重要保障,由于农村妇女的发展基础较为薄弱,需要与多元主体之间形成良好的合作关系,从而在与多主体协作的过程中获取支撑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动能;政治发展能力是必然要求,保障农村妇女通过村庄政治的普遍性参与,在公共事务中表达自己真实的发展需求,对自身乃至整个乡村的政治生态产生长远的积极影响。

如图1所示,本文构建了社会工作助推农村妇女新内生发展的“嵌入—能力”分析框架。其中,社

社会工作作为外部系统的主体,带领包括政府、市场、高校、其他社会组织等行动主体,面向“以农村妇女为核心,以整个乡村社会为基础的内生系统”,通过情感、资源、关系与价值嵌入的方式,实现外部系统与内部系统的深度耦合与协同,激活和提升农村妇女的文化、经济、社会、政治四个维度的内生发展能力,实现农村妇女的“造血式”、可持续发展,迈向新内生式发展格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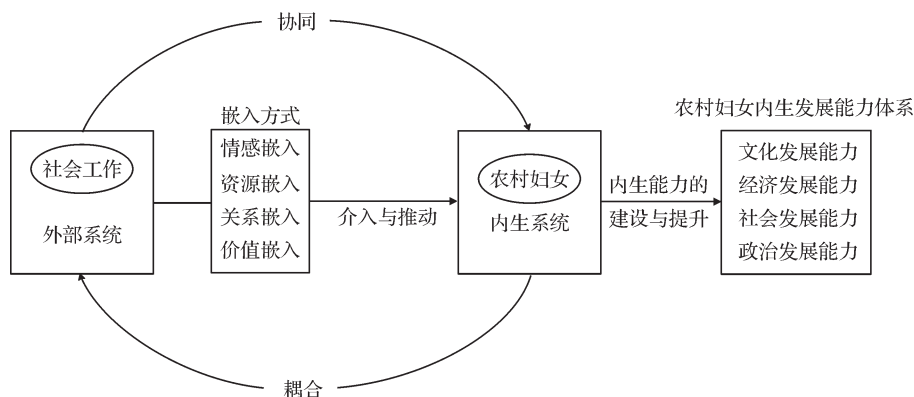


图1 社会工作助推农村妇女新内生式发展的“嵌入—能力”分析框架

情感嵌入属于精神层面的嵌入。地方性文化是农村妇女集体记忆的特殊载体和地方性身份识别的重要依据,是维系妇女间凝聚力的纽带^[27]。传统文化远不止是历史的堆积,同时深植于个体的精神世界之中。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加速,乡土人文不断褪色,农村妇女愈发受到市场经济的冲击,无法认识到传统文化所蕴含的精神价值^[28]。因此,社会工作在与农村妇女互动的过程中,将与文化认同相关的高度情感能量嵌入妇女们的日常生活中,促使农村妇女主动投入文化性的乡村活动,激活农村妇女的文化发展能力。

资源嵌入属于物质层面的嵌入。资源是各种发展性要素的集合^[29],能够保障农村妇女在乡村社会中开展经济生产活动时拥有充足的物质资料。农村妇女受到传统性别角色分工、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社会与传统文化、政策与制度屏障等因素的影响,存在资源获取方面的诸多限制。因此,社会工作需通过与外部主体之间的对接,将外部资源嵌入乡村场域中,与农村妇女的需求进行有效对接与整合,提升农村妇女的经济发展能力。

关系嵌入属于行为层面的嵌入。在一定的社会情境中,经济行为总是与社会关系网络相适应^[30]。农村妇女的社交范围局限,难以与其他农户、村集体、外部主体等紧密联合起来,开拓现代化的农业生产经营思路,只能依赖传统的农业生产模式或手工艺品加工获取经济收益。社会工作需以关系嵌入的方式,积极融入农村妇女的社会行动网络中,使农村妇女与其他行动主体在利益共享的前提下达成深度合作,将农村妇女从乡村场域中单一发展的个体转变为城乡协同发展结构中的一员,形塑农村妇女的社会发展能力。

价值嵌入属于认知层面的嵌入。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过程中,公共性价值是实现村庄善治的重要“软实力”。乡村公共精神体现在乡村居民的日常生活与公共社交中,其核心是保护和促进乡村的集体和公共利益。这种精神以参与管理和决策乡村公共事务为主要行动方向,涵盖了民主、平等、利他主义、责任和秩序等多个层次的内容^[31]。随着乡村公共空间的失落与乡村公共精神的消解,农村妇女在价值层面趋向去公共性、在行为方面趋于个人化,对公共事务漠不关心。因此,社会工作应面向农村妇女的内在认知与外部行动,嵌入价值以在“生活化”情境中重塑农村妇女的公共精神、鼓励农村妇女积极参与乡村公共事务,培育农村妇女的政治发展能力。

二、案例描述:“妈妈味道”妇女合作社项目的发展历程

1. 案例背景

本文以江西省萍乡市友谊社会工作机构在本市南县林村开展的“妈妈味道”妇女合作社项目作

为研究案例。林村地处萍乡市南县中部,村域总面积10.5平方千米,覆盖10个村小组、11个自然村、535户、2691人,其中女性村民共1647人。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林村越来越多的男性青壮年劳动力前往城市务工,大量的妇女留守农村。2021年4月在南县民政局、妇联的指导和支持下,村“两委”引入萍乡市友谊社工机构开展农村妇女发展实践,目的是在社会力量的推动下,充分激发本村妇女的内生发展能力。基于此,友谊社工机构面向林村妇女开展了“妈妈味道”妇女合作社服务项目,坚持以农村妇女为发展主体的行动原则,发展农村妇女合作经济组织,以“妈妈味道”妇女合作社为载体,在推动合作社发展的过程中激活并提升农村妇女的内生发展能力,最终推动农村妇女真正成为乡村建设的实施者、决策者、引导者和受益者。

本文的经验材料源于研究者在林村调研期间形成的观察日记、田野笔记和访谈记录。研究者在与友谊社工机构理事取得联系并获得项目参与和调研权限后,于2024年4月1日至6月5日在林村内部进行田野调研。在此期间,研究者不仅对服务项目进行了深层次的了解,也与参与此次服务项目的一线社工、部分林村妇女等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为本文经验材料的获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外,研究者于2024年7月17日到7月30日期间重新返回林村,进行经验资料的补充。

2. 案例的四个发展阶段

从时间线梳理,“妈妈味道”合作社项目发展的历程可分为四个阶段,即起步期(2021年5月至9月)、发展期(2021年10月至2022年11月)、深耕期(2022年11月至2023年12月)、成熟期(2024年1月至今)。

第一阶段是起步期。社工通过挖掘文化资源与创建兴趣社群的实践策略,激活了农村妇女的文化发展能力。社工发现,饮食实践是林村妇女一生中最重要的家庭责任之一,她们在日常“食作”中不仅记录了家人对特定食材、口味的偏好,还将此作为一种家族、社群内的传统和价值传承给后代。鉴于此,社工在村内创办了一系列乡村文化活动,建立妇女们与本地文化之间的情感链接点。随后,在社工的召集下,由6名林村妇女组成的“林村妈妈”美食支持小组正式成立。组员们在美食制作、厨艺心得交流、传统饮食文化宣传等小组活动中不断进行交流和互动,彼此理解、互帮互助,“林村妈妈”美食支持小组这一兴趣类社群成为将妇女们进一步紧密联结起来的情感纽带。

第二阶段是发展期。社工通过外部资源链接与资源精准赋能的实践策略,提升了农村妇女的经济发展能力。首先,“林村妈妈”美食支持小组在社工的推动下正式向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妈妈味道”妇女合作社转变。该合作社采用了“合作社+妇女个体入股”的组织形式,以农村妇女自主饲养和种植的麻鸭、辣椒、糯米等畜产品和粮食作物为原料,进行本地特色菜“血鸭”的预制菜加工,面向县域范围内的小型商超和餐饮门店销售,形成“供—产—销”为一体的食品加工产业链。其次,社工以资源赋能的方式提高了农村妇女的集体生产活力、生产创新能力与技术进步能力。至此,合作社脱离了“小作坊”的经营处境,实现了“从田野到市场”的发展转变,大幅度地提升了合作社的经济效益。

第三阶段是深耕期。社工通过优势功能整合与产业横向融合的实践策略,形塑了农村妇女的社会发展能力。首先,社工带领合作社妇女们突破农村地域限制,融入更广泛的社会交往范围,加强与南县自然资源局、文化旅游局、村“两委”、企业等行动主体之间的深度对接,推动妇女们在整体性视角下对外部行动主体的功能优势进行整合。在社工与妇女们的努力下,“妈妈味道”妇女合作社与各部门、各社会力量形成通力合作,建立彼此间的长期和稳固的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当地集“美食+”多元产业为一体的“林村周末两日游”旅游线路。该旅游线路以林村的优秀传统文化为背景,以“吃”为核心,以“游”为起点,以“娱”和“购”为协同,带动“住”的消费。

第四阶段是成熟期。社工通过重构公共空间与培育妇女骨干的实践策略,培育了农村妇女的政治发展能力。社工将村内两间疏于修缮的棋牌室进行合并、整修,并挂牌“妇女茶社”,作为合作社社员的公共活动空间。起初,妇女们也只是每晚聚在茶社内聊天。随着时间的推移,妇女们开始相互分享村庄新闻,讨论共同关注的村庄公共事务。当这种常态化的社交活动逐渐与村庄政治交织在一

起时,妇女们的公共参与意识也随之被唤醒。然而,精神层面的公共参与意识仍需进一步转化为现实生活中的政治实践,农村妇女才能真正摆脱自身在村庄政治体系中所处的边缘性地位。在社工的倡议下,妇女们根据道德品质、社会责任感等评价要素在合作社内部投票选出8名成员作为妇女骨干。社工随后为这些妇女骨干提供个人督导,帮助她们进一步识别潜力、树立自信,借助妇女骨干的力量引导其他妇女切实成为村庄事务的参与者。

经过3年多的实践探索,“妈妈味道”妇女合作社成员已经由最初的6名妇女发展至如今的58人,合作社种植油茶树、辣椒、生姜等经济作物80余亩,每年养殖本地麻鸭5批,每批500~600只不等。社员们将这些自主种植和养殖的作物与麻鸭部分直接对外销售,赚取收益以维持合作社的日常运转,其余部分则经过生产加工后形成血鸭预制菜品,面向各平台销售,这部分所创造的年收益达到50万余元,社员的人均年增收达到4000余元。同时,多名妇女因在乡风文明建设、村庄环境整治、移风易俗等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而在村级妇女表彰大会上受到嘉奖,被授予“最美志愿者”“优秀妇女个人”等称号。可见,在社工的推动下,由林村妇女组成的“妈妈味道”妇女合作社已然成为该村经济发展的动力引擎,妇女们也为乡村建设贡献了不可小觑的巾帼力量。

三、案例分析:社会工作助推农村妇女新内生式发展的机制及其条件

1.“何以嵌入”:社会工作助推农村妇女新内生式发展的运作机制

“嵌入”实质上是社会工作构建农村妇女内生发展能力体系的基本路径,从动态实践的视角来看,需要分析社会工作是如何经由“情感—资源—关系—价值”的嵌入方式与以农村妇女为核心的内生系统产生互动并影响农村妇女的主体行为。

(1)情感嵌入机制:嵌入日常生活以塑造农村妇女发展源动力。在以往的农村妇女发展项目实施过程中,由于农村妇女自身发展动力不足,项目难以为继,需要通过外部主体的介入塑造农村妇女发展的“源动力”。文化作为乡村振兴中最持久的生命力,是塑造农村妇女发展动力的内在根源。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冲击下,今日的乡村正日益陷入“文化衰落”的困境,但乡村文化的基本形式与内在价值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32]。因此,社会工作在面对农村妇女展开服务时,需要以挖掘乡村优秀文化资源为切入点,激活农村妇女的文化发展能力,以塑造农村妇女的发展源动力。

相较于城市地区,乡村社会的日常生活具有绵延性和弥散性^[33],社会力量在介入农村场域的过程中可能因城乡文化的差异性而难以对村庄的文化背景及村民的真实生活状况有相对清楚的了解。对此,社工机构采取了“逐步深入”的行动策略,首先在林村设立工作据点,派驻一线社工在乡村内部“扎根”。随后,社工机构以举办文化仪式与创办文化小组的实践策略,进一步挖掘通过复兴传统乡村文化和营造互动场合,构建妇女与本土文化之间的情感联结,唤起农村妇女群体的“乡土情怀”,推动农村妇女自觉、积极地投入自身的发展实践中,从而将与文化相关联的高度情感能量嵌入农村妇女的日常生活中,完成了对农村妇女日常生活的“深度嵌入”。

在情感嵌入层面,社会工作以社会组织的形式扎根并融入乡村社会内部,整体内嵌于乡村场域中,社工通过前期的调研走访,深入了解了林村的基本信息与农村妇女的文化生活状况,以长期的社会工作“主体性在场”的形式,与农村妇女发展乡村社会中的“熟人关系”,初步获取农村妇女的信任和支持,为妇女们后期的持续性发展行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资源嵌入机制:嵌入妇女经济组织以实现资源高效转化。经济发展能力在农村内生发展能力体系中占据核心地位,直接影响着农村妇女的生存状态。只有当原本呈现“原子化”的农村妇女组织起来,且组织化程度越高时,农村妇女才能更好地整合并利用外部资源,改善自身的经济发展能力^[34]。社会力量在推动妇女组织化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也是对农村妇女新内生式发展的关键诉求,即在外源力量的辅助下,提高农村妇女的组织化水平,将农村妇女组织作为承接和转化外部资源的“中介”,增强集体和个人的经济资本,提升自我发展能力。

随着项目的发展,社工逐渐意识到,在美食支持小组中,妇女间仅仅由对乡土饮食文化的集体性

认同和共同兴趣所联系,并未产生更广泛的经济联系,较低的组织化程度使得外部资源难以在农村妇女群体中实现下沉导入。为进一步提升组织化程度,社工与妇女们多次商讨后,美食支持小组正式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转化——“妈妈味道”妇女合作社正式成立。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社工首先协助合作社以“农户联保+农民合作社担保”的方式向南县农村信用社申请免抵押小额农业贷款,帮助那些具有较强的入社意愿却缺少资金的农村妇女解决了资金难题,合作社的人力资源亦得以补充;其次,社工邀请萍乡市某大学的一名食品科学教授及其团队长期为社员们提供血鸭调味底料、血鸭自热米饭等更迎合城市消费者口味和生活节奏的生产加工工艺培训;最后,社工与萍乡市某食品机械有限公司取得联系,使合作社以低于市场价40%的价格购买了智能化的食品原料加工、熟化加工、杀菌、包装等设备,并邀请该企业两位市场专员来林村为妇女们提供了为期5天的设备使用培训。在金融、知识、技术等外部资源的推动作用,农村妇女针对市场环境对合作社生产规模、产品类型、生产方式等方面作出调整,跳出了传统的作坊式生产模式、更新了创新型产品品类、构建了现代化、规范化的生产和加工体系,对接了更广泛的连锁超市、生鲜超市、线上平台等多元化销售渠道。

在资源嵌入层面,社会工作以推动组建妇女经济合作社为起点,以提升农村妇女经济发展能力层面所需的关键要素为需求指引,引领外部多元主体发挥各自的资源优势,将外部优质资源嵌入由农村妇女构成的集体性经济组织中。在此过程中,金融、知识、技术等资源从组织层面向内渗透,通过对农村妇女的资源赋能,推动妇女的经济发展能力不断增长,即将外部资源转化为农村妇女的经济资本,进而成为乡村经济发展的主体。

(3)关系嵌入机制:嵌入合作网络以提供农村妇女可持续性发展动能。经济行为是深嵌于社会关系之中的,社会发展能力确保了农村妇女能够更好地与外部主体交流、理解市场需求并迅速对经济活动作出调整,为农村妇女的发展提供有力保障。要推动农村妇女新内生式发展,必须促进内部主体与外部主体的有机联动,形成持久的发展动能,使农村妇女发展步入良性循环。对于社会工作而言,需要进一步协助农村妇女与其他主体间建立合作关系,这不仅涉及合作社妇女之间的有机互动,也包括妇女们与村“两委”、企业等主体之间的深入合作。

本案例中,社工以“妈妈味道”妇女合作社目前拥有的食品加工产业为核心,链接与产业相关的上下游主体,推动当地旅游业、服务业向食品加工产业渗透,形成“食品加工+N”的产业结构。但在多元主体间进行横向融合的过程中,一是合作社内部的农村妇女之间可能因收益分配等问题产生矛盾。为了应对合作社妇女在利益分配上的矛盾与分歧,社工协助妇女们在合作社内部构建了更加完善的内部沟通和决策机制,确保所有成员都能在决策过程中有发言权。这种参与模式不仅能够缓解妇女间因不公平分配而引发的紧张情绪,同时增强村民对项目的归属感和责任感,提高项目的可持续性。通过上述策略的实施,合作社内部各妇女的行动目标与整体项目目标相契合,实现了内部行动的耦合。

二是不同的外部行动主体因立场不同,易产生难以克服的利益纠葛,不利于形成稳定的协作格局。例如,为产业融合提供资金、技术支持的企业追求商业和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而村“两委”则更注重乡村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与实现村集体的共同福利。于是,社工创建了由合作社、企业、村“两委”代表组成的联合协调小组,明确各方职责,定期讨论合作进程中的问题和挑战,共同制定解决方案。此外,社工还引入了第三方评估和监督机构,以增强合作模式的透明度和公信力,确保所有行动主体在产业融合发展过程中的利益得到平等回应。

在关系嵌入层面,社会工作将以“互惠互利”为取向的社会关系嵌入农村妇女与外部主体的互动行为中,形成一种“内外协同”的开放、动态、流动的互动与协作合作网络。在此过程中,“妈妈味道”合作社亦成为兼具经济性与社会性的妇女组织:农村妇女从以往的资源接受者转变为产业融合的策划者和执行者,使得妇女们能够在合作社发展的进程中扮演更加核心的角色,从传统意义上的边缘群体转变为能够独立思考和社会行动的关键成员。

(4)价值嵌入机制:嵌入公共情境以推动农村妇女主体性生产。近年来,在政策支持下,部分地

区农村妇女的政治地位得到了很大提升,但“即便是在一些妇女参与乡村治理程度较高的地方,其动力也主要依赖政府的行政推动或相关项目的支持,一旦政府发展重心转移或项目完成,便会出现明显回落。”^[35]因此,如何培养农村妇女的政治发展能力,实现妇女在村庄公共事务治理中的话语权与决策权,为乡村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真正成为乡村历史主体,是实现农村妇女新内生式发展的关键。

社工以日常生活为切入口,将“妈妈味道”合作社在前期积累的人力、经济、社会等资本投入乡村治理的“微小”治理事件中,形成农村妇女内源力量自下而上“反哺”村庄建设的“生活化治理”格局。在具体实践中,社工先建立“妇女茶社”,为“妈妈味道”合作社成员营造开放包容的公共活动氛围,拓宽农村妇女参与公共生活的渠道。这一举措为农村妇女自由交流、参与村庄公共事务提供了特有的空间,有效推动了乡村公共精神在妇女集体中的再生与加强。接着,社工在妇女们的举荐下在合作社内部选拔并培养了多名妇女骨干,通过专业的督导形式促使她们转变为公共事务的活跃参与者,妇女骨干在乡村社会中的影响力日益增长。在此推动下,其他农村妇女纷纷参与到村中“细小但不琐碎”的公共事务管理中,如垃圾分类和处理、村庄基础设施的维护、组织文体活动等,力图把“村里事”变成“自家事”。

在价值嵌入层面,社会工作将一种“日常性关切”的价值意涵嵌入至乡村公共情境中,以契合农村妇女对参与村级公共事务的普遍现实需求,随后将认知层面的公共价值性转化为农村妇女面向乡村日常生活的集体治理行动,实现农村妇女主体性的生产与再生产。相较男性而言,林村妇女虽然在村庄政治核心权力区域的参与比例依然偏低,但她们仍扭转了社会对农村妇女群体存在的“刻板印象”——农村妇女并非不具备公共参与的能力,在外源力量的推动下,她们同样能够以日常生活为面向,“自下而上”“细水长流”地凭借自身力量反哺乡村社会。

2.“以何嵌入”:社会工作助推农村妇女新内生式发展的条件要素

本文在新内生发展理论与嵌入理论的耦合下,厘清了社会工作参与农村妇女新内生式发展的动态运作机制,即回答了社会工作“怎么做”的问题。这也引发研究者的进一步思考:促成上述运作机制的条件要素是什么?与动态化的运行机制相比,条件要素更关注社会工作参与农村妇女新内生式发展实践所需具备的静态要素支撑,即试图回答“为什么”的问题。这要求研究从知识生产的角度出发,以一种开放探索的态度考察社会工作如何在专业实践中重整自身的方法、技术、目标与价值,达成经验与理论的适配^[36-37]。结合本文案例,社会工作助推农村妇女新内生式发展的条件要素应包含方法层面的文化敏感性要素、技术层面的专业性要素、目标层面的社会性要素与价值层面的日常性要素。

(1)文化敏感性要素。文化敏感性要素是在“面对城乡文化时,能够以文化反思重构社会工作的服务体系,其根本上需要形成一种范式转换,强调个人的工作、文化及权力对他人可能存在的压迫”^[38]。虽然社会力量进入乡村场域时往往已经获得了基层政府的合法性准入,但通常缺乏“情境合法性”,使得外部力量“悬浮”于既有的社区治理场域^[39]。社会工作秉持的文化敏感性要素使其在进入乡村场域时能够厘清自己的身份边界,并在对接村民时获得集体性回应,且不会造成对妇女群体的权力压迫。

本案例中,社工一方面在入驻林村的前期采用了“口述见证”的方式,聆听超越主流话语之外的、农村女性的主体性声音,同时从中挖掘平日“隐而未见”的在地性知识。另一方面,社工从“文化仪式”的概念出发,使农村妇女在多主体参与、交流、互动的集体性叙事行为中完成了正向情感能量的交换和积蓄,例如社工定期在全村范围内举办“乡土记忆美食比拼”比赛,设立一、二、三等奖,鼓励村内妇女前来参与。在熟人社会的乡村公共舆论场域,公开颁奖的形式表面上是为个人赢得物质奖励,对获奖妇女的厨艺进行嘉许,实质上是利用伦理价值、人情脸面等社会资本在文化仪式中强化了妇女的精神满足感。

(2)专业性要素。专业性要素是社会工作助推外部资源精准嵌入农村妇女发展场域的技能保障^[40]。社会工作的专业性主要体现在理念创新的层面。技术行为始于专业理念,若社会工作始终以

西方的知识体系作为自身的理论模式和实务原则,可能会陷入“技术主义陷阱”之中。因此,社会工作在进行实践的过程中不断进行专业理念本土化和创新,确保项目更加贴合服务对象的实际需求和
社会文化环境。

在农村妇女内生发展能力的萌芽阶段,超地方因素可以在其中发挥激活与催化的作用,因此引入外部相应的资金、技术与信息等资源是必要的。本案例中,社工以“资源变资产”的经济发展创新理念为出发点,坚持带领农村妇女走“文化增值”的发展道路。在此基础上,社工格外注重乡村人文资源与外部资源的有机结合,在内部需求指引的原则下、以整体性的视角整合并链接外部资源,提升外部资源的转化和利用率,减少资源的低效配置。在外部资源的精准赋能下,农村妇女转变生产方式、创新生产理念,真正从“农民变股东”,将“资源变资产”。

(3)社会性要素。从嵌入理论的视角来看,社会性的基本内涵是:将经济行为嵌入社会关系中,重建社会信任与社会联结,在现有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中倡导和发展互惠的社会关系,从而发展社会联系、塑造共同价值,促进人们在其中发展本真的自我并为人类共同福祉服务^[41]。换言之,农村妇女的发展是无法在真空环境中实现的。社会性要素确保了社会工作在推动农村妇女的发展实践时避免了“个体化”倾向,通过充分发掘和利用乡村社会内外的各种社会团结、社会支持因素,将“强社会关系网络”作为联结农村妇女和外部主体紧密合作关系的重要纽带。

“妈妈味道”妇女合作社进行产业横向融合的实质是与产业相关的多元主体在遵循互惠互利关系取向的基础上延伸出来的利益纽带关系,但由于多元主体的利益关系复杂,使得内外“合作联盟”容易出现利益分配上的分歧。对此,社工一方面鼓励和促进农村妇女参与到产业发展决策过程中来,另一方面建立沟通平台或组织研讨会、会议等活动,将不同利益相关者聚集起来,倡导制定更有利于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包容性政策。如此,合作社妇女通过与其他主体形成深入的互动和联结,形成了内外协同的强关系社会网络,这也为妇女主体性的强化提供了可靠的社会性基础。

(4)日常性要素。社会工作的日常性要素需要从“日常生活”这一概念的脉络中加以理解。日常生活是许多学者从文化角度理解农民日常行为的关键词。如赵普兵等归纳认为“过日子”就是中国农民的日常生活实践^[42]。农村妇女是乡村社会中日常生活的主要实践者,她们在“过日子”的过程中创造、传承了独特的乡土文化。在农村场域中,社会工作专业实践无论如何进行,都必须在“日常生活”这一底色上展开。简言之,社会工作的日常性要素就是社会工作者需要在把握宏观层面的社会性和中观过程中的实践性的基础上,将服务渗透到农村妇女的日常生活中去。

现有关于农村妇女进入村庄政治环境的路径研究主要是妇女竞选村委会成员、参加村委会议、参与基层民主政治,或是妇女通过村委会提供的可能渠道表达、监督村务管理意见等。但能够参与“国家政治”的农村妇女毕竟只是少数“精英女性”,大部分普通农村妇女参与基层政治的路径极为缺乏。为拓宽农村妇女参与村庄整治的路径,社工通过村内两间棋牌室的物理空间重构,营造了公共参与的氛围,进而通过妇女骨干的引领作用达成了妇女间的共同行动。可以说,社会工作凭借日常性要素在普通农村妇女个体及其家庭与村庄实际、国家政策之间难以建立起紧密的联结,将“家国一体”的概念在实践中加以具象化。与男性主导话语体系的村庄治理模式不同,农村妇女进行的村庄政治实践似乎少了些许“功利”,而多了女性特有的“生活化”色彩。

四、结论与建议

社会工作助推农村妇女新内生式发展的实践路径是在强调农村妇女“本位”的基础上,以情感嵌入、资源嵌入、关系嵌入、价值嵌入的方式,激活并提升农村妇女的文化发展能力、经济发展能力、社会发展能力、政治发展能力,构建农村妇女“复合型”内生发展能力体系。如图2所示,社会工作首先扎根于本地情境,深入农村妇女的日常生活,探寻农村妇女在乡村文化方面的微观行动逻辑;其次充分挖掘内部系统的资源禀赋,推动成立妇女经济合作社,利用组织化平台有效承接并转化外部优质资源,重构了农村妇女的经济资本;再次在利益共享的基础上构建内外联动的“合作共同体”,为农村

妇女的良性发展提供动能保障;最后推动农村妇女以日常生活为切入口反哺乡村社会,形成“政—社”间的良好互动,且以“日常生活”为核心要素的公共性价值确保了这种政社互动是以“农村妇女本位”为基本前提的。从静态要素来看,外部力量在推动农村妇女新内生式发展实践的过程中面临着服务情境“悬浮”、资源分配失衡、多元主体利益分散、政治参与路径缺乏四个层面的问题,而社会工作的文化敏感性、专业性、社会性、日常性要素能够化解以上行动困境,为社会工作助推农村妇女新内生式发展的运作机制提供了坚实的内在支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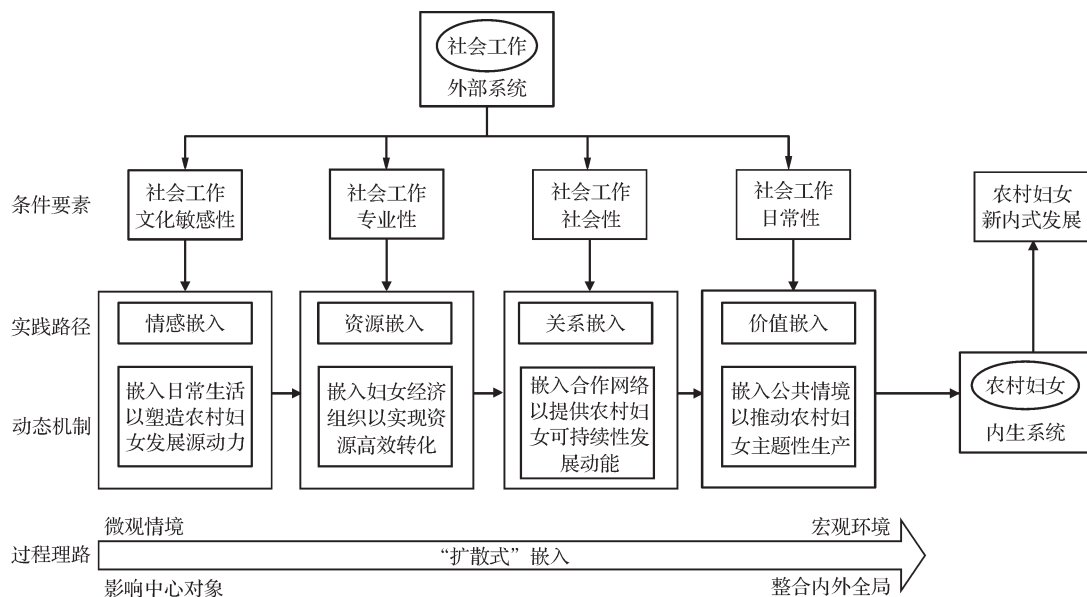


图2 社会工作助推农村妇女新内生式发展的逻辑与过程

进一步探究,社会工作参与农村妇女新内生式发展的整体运作机制可被归纳为一种“扩散式”嵌入的动态过程,这一发现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理解:在行动次序上,社会工作遵循着从“微观情境”扩散至“宏观环境”的嵌入轨迹;在目标导向上,社会工作呈现出从“影响中心对象”扩散至“整合内外全局”的嵌入格局。这种时空并进的“扩散式”嵌入过程,既是社会工作理性设计的产物,也是在地实践动态调适的结果。在以往有关社会力量介入某一群体发展过程的研究中,学者们往往将社会力量嵌入具体场域的机制归纳为“硬嵌入”与“软嵌入”^[43]两种具体类型,硬嵌入指社会力量从主体、制度和目标等层面多重结构性嵌入内部系统,软嵌入则考虑到除结构外的软嵌入形式,如功能、关系、认知等维度,但上述研究取向往往忽略了社会力量作为行动者的立场、思维与行动过程。尽管硬嵌入与软嵌入仍是社会工作参与农村妇女发展进程的主要路径,但需要跳出以往“宏观—微观”的二元分析框架,以更宽广的研究视野,回到社会工作本身的立场。伴随着城乡融合战略的深入推进,社会工作在参与农村妇女新内生式发展的过程中将面临更加复杂的情境,本文在结合嵌入理论与新内生式发展理论的基础上,将嵌入路径细化为“四重嵌入”,在此基础上提出的“扩散式”嵌入机制对理解社会力量参与农村妇女新内生式发展的行动逻辑有参考意义。

基于以上结论,对进一步推动农村妇女的新内生式发展、促进农村妇女全面参与乡村振兴提出如下建议:第一,完善社会工作参与农村妇女专业服务的制度环境,提升社会工作在农村妇女群体中的认同度;第二,推动社会工作的创新意识,以多种形式的社会创新手段,提高外部主体参与农村妇女发展实践的有效性与可持续性;第三,重视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等现代化数字技术,为社会工作参与农村妇女发展实践提供良好的技术支撑;第四,社会工作应时刻反思为农村妇女提供的专业服务是否符合妇女的日常需求,会不会因目标“过于宏大”而显得“阳春白雪”“不接地气”。在乡村社会中,农村妇女往往能在“不那么理性”的事件中利用自己独有的“生活智慧”,改变个人处境,进而对乡村社会结构作出改变。这种改变可能是微不足道的,但仍能在日积月累的沉淀中凸显其重要价值。

参 考 文 献

- [1] 焦克源,杨乐民.农村“妇小贷”政策受众满意度研究[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48(3):103-112.
- [2] 顾永红,向德平,胡振光.可持续生计视角下连片特困地区妇女贫困研究[J].江汉论坛,2014(6):136-140.
- [3] 陈雄锋,蔡茂华,刘运春,等.农村留守妇女居家创业模式探讨——以蕉岭县大豆产业项目为例[J].广东农业科学,2012,39(7):202-203,206.
- [4] 陈秋.女性民俗与农村妇女的村庄政治参与——以温州L村为个案[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34(3):78-85.
- [5] RAY C.Culture economies:a perspective on local rural development in europe[M/OL].Centre for Rural Economy New-castle University,2001[2025-04-18].<https://www.ncl.ac.uk/mediav8/centre-for-rural-economy/files/culture-economy.pdf>.
- [6] 郭家峰.生活化治理:乡村文化振兴的内源性路径转向与实践——基于“赣南新妇女”运动的考察[J].江海学刊,2022(3):122-131.
- [7] 崔盼盼.乡村文化振兴的主体再造与路径创新——以“赣南新妇女”运动为例[J].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39(3):101-110.
- [8] 陈义媛,李永萍.农村妇女骨干的组织化与公共参与——以“美丽家园”建设为例[J].妇女研究论丛,2020(1):56-66,109.
- [9] 闫红红,张和清.优势视角下农村妇女组织与社区参与的实践探索——以广东省M村妇女社会工作项目为例[J].妇女研究论丛,2019(2):44-54.
- [10] MARKANTONI M, STEINER A, MEADOR J E, et al. Do community empowerment and enabling state policies work in practice? Insights from a community development intervention in rural Scotland[J]. Geoforum, 2018,97: 142-154.
- [11] SCOTT M, GALLENT N, GKARTZIOS M.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rural planning[M].New York:Routledge,2019:11-12.
- [12] 方劲.乡村发展干预中的内源性能力建设——一项西南贫困村村庄的行动研究[J].中国农村观察,2013(4):31-41,95.
- [13] MITLIN D, SATTERTHWAITE D. Empowering squatter citizen[M].Lodon: Sterling,2004:29.
- [14] 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M].冯钢,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
- [15] GRANOVETTER M.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5, 91(3): 481-510.
- [16] 李琳,桑坤.场域关联、差序嵌入与信任结构的再生产——基于华北一所科技小院的经验研究[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38(1):37-49.
- [17] 武小龙,康旭晖.“曲线型”嵌入:社会工作机构参与社区治理的过程逻辑[J].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38(5):39-52.
- [18] 邵宪达,兰树记,陆德泉.社会工作的社会性与再嵌入策略——新波兰尼视角下社会创新的启示[J].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39(2):29-40,119.
- [19] 姚德超,刘筱红.农业女性化视野下农村妇女发展的困境与政策调适——基于阿玛蒂亚·森自由发展观的分析[J].兰州学刊,2012(8):74-78.
- [20] 文军,刘雨航.迈向新内生时代:乡村振兴的内生发展困境及其应对[J].贵州社会科学,2022(5):142-149.
- [21] 王晓莉,高端阳.妇女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思想演进与核心问题[J].科学社会主义,2023(4):88-95.
- [22] 张欢欢,陶传进.“赋权理论”视角下农村妇女参与乡村振兴的路径研究——以S公益项目为例[J].贵州社会科学,2020(3):161-168.
- [23] 何威.现实形塑与科学回归:社会工作“嵌入式发展”的规范图景及其超越[J].社会科学,2023(4):167-180..
- [24] 徐选国,罗茜.嵌入何以发展:社会工作本土化进程中嵌入观的流变与再构[J].新视野,2020(1):50-58.
- [25] 陈宇.乡镇社会工作嵌入式发展的行动逻辑及实现路径[J].学术论坛,2023,46(6):97-105.
- [26] 李斌,汤秋芬.从“迷茫性脱嵌”到“分化性嵌入”:社会工作助推失地农民就业的研究[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2(6):124-131.
- [27] 赵爱霞,左路平.论文化记忆及其意识形态功能[J].思想教育研究,2022(2):80-86.
- [28] 赵志强,禹雪.新内生发展理论视域下职业教育赋能乡村人才振兴的逻辑与策略[J].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报,2024(2):113-123.
- [29] GIDDENS A.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M]. Cambridge:Polity,1984.
- [30] 巩慧臻.关系嵌入、利益联盟与“大托管”经营方式创新——基于淮南市店集村的案例分析[J].农村金融研究,2024(3):55-66.
- [31] 王丽.善治视域下乡村治理的公共性困境及其重构[J].行政论坛,2022,29(3):99-104.
- [32] 赵秀玲.乡村文化振兴的历史演进与创新路径[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4):38-48.
- [33] 范雅娜.情境嵌合:乡村振兴过程中农村社会工作的价值实现路径[J].探索,2022(6):120-133..
- [34] 王丽.善治视域下乡村治理的公共性困境及其重构[J].行政论坛,2022,29(3):99-104.
- [35] 杨宝强,钟曼丽.从“缺场”到“在场”:乡村振兴背景下少数民族农村妇女参与村级治理研究[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43(11):202-208.

- [36] JULKUNEN I. Knowledge-production processes in practice research-outcomes and critical elements[J]. Zbornik instituta za pedagogoska istrazivanja, 2011, 47(1):109-128.
- [37] 陈海萍. 科学理性抑或回归日常? ——社会工作实践研究的迷思[J].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报, 2024, 44(4):123-139, 144..
- [38] 焦若水, 高怀阳. 揽镜自鉴: 多元文化社会工作的理论争辩与本土反思[J].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46(1): 77-88.
- [39] 侯利文, 徐永祥. 被忽略的实践智慧: 迈向社会工作实践研究的新方法论[J]. 社会科学, 2018(6):82-93..
- [40] 徐成铭, 刘川峰. “三重嵌入”: 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残疾人服务的案例研究[J]. 残疾人研究, 2024(3):32-42.
- [41] 郇宪达, 兰树记, 陆德泉. 社会工作的社会性与再嵌入策略——新波兰尼视角下社会创新的启示[J]. 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39(2):29-40, 119.
- [42] 赵普兵, 刘义强. 惯习、秩序与生活理性: 一个民族村庄的治理逻辑——基于西藏自治区江孜县 A 村的观察[J]. 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 37(2):41-47.
- [43] 许爱梅, 崇维祥. 结构性嵌入: 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实现机制[J]. 党政研究, 2019(4):32-37.

How Social Work Promotes Neo-Endogenous Development of Rural Women?

QI Yingfei

Abstract The endogenous development of rural women directly influences the trajectory and outcomes of rural economic and social progress. Using an integrated “capability-embeddedness” analytical framework,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operational mechanisms and conditional factors through which social work promotes rural women’s neo-endogenous development.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from a dynamic perspective, social work embeds emotions into daily life to cultivate rural women’s intrinsic motivation for development, embeds resources into women’s economic organizations to enable efficient resource transformation, embeds relationships into cooperation networks to provide momentum for women’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embeds values into public contexts to enhance women’s subjectivity in production. Collectively, these mechanisms construct a “diffusive embeddedness” pathway, establishing a comprehensive endogenous development ability system for rural women. From a static perspectiv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equires cultural sensitivity, professionalism, and daily elements as internal supports. Specifically, cultural sensitivity helps social work gain “situational legitimacy” for its service, professionalism enhances the utiliz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efficiency of external resources under innovative ideas, sociality ensures that social work avoids excessive individualization in practice, and daily elements create a life-oriented path for rural women’s participation in rural politics.

Key words rural women’s development practice; neo-endogenous development theory; embedded theory; social work

(责任编辑:余婷婷)